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农 学 原 论

NONGXUE YUANLUN

现代日本社会
科学名著译丛

[日]祖田修 / 著
张玉林等 / 译
张玉林 / 校

现代日本社会
科学名著译丛

农学 原论

○ [日] 祖田修 / 著
○ 张玉林等 / 译
○ 张玉林 /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学原论 / (日) 祖田修著; 张玉林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ISBN 7-300-03631-7/F·1381

I . 农…

II . ①祖…②张…

III . 农学 - 研究

IV . S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627 号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农学原论

[日] 祖田修 著

张玉林等译

张玉林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tr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5 000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SAISON 文化财团资助

编选委员 王洛林 堤清二
生野重夫 朱绍文

主编 朱绍文

编委会 王 霖 朱绍文 朱 玲 朱荫贵
李 薇 江瑞平 陈 建 陈 莹
陆华生 张京萍 周蔚华 林燕平
胡企林 郭连友 胡欣欣 韩朝华



畠田修先生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总序

为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科教兴国”已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目标。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付出了多少代价。回顾人类近代化的历史，所有发达国家在走上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不以“科教兴国”为其先行条件。英国是近代最早走上产业革命道路、实现市民革命的国家，在受压迫的英国中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推翻封建统治的时代，也是依靠划时代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看到英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的足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是一幢古老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另一边是一幢以近代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命名的大楼，这正象征着一个国家要成功地走上近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国家的文明、民主和富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为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美国、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落后于英国，在它们追赶英国，为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免遭淘汰而斗争时，也是首先认真地向先进的英国学习，引进英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缩短其落后差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然而在我国，往往侧重于引进属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以谋求工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轻视甚至忽视培养建立现代社会科学队伍。特别是在原苏联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的名称是在19世纪以后才获得公认的地位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大学讲坛上，一般都使用“道德哲学”这一名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抬头，“道德哲学”已不能涵盖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科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通用的科学名称。社会科学在17—18世纪初得到了大发展。例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于1651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1755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经济学方面，魁奈的《经济表》，1758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休谟的《大不列颠的历史》，1754—175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是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兴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劳资纠纷也日益显著，从而也就出现了表达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的著作，所以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因而必然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 17、18 世纪的几部经典名著，是受尽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皇权、神权和城市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而奋起求解放的中下层人民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们都是寻求“人的解放”的科学指南。任何时代的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都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作为经典的价值。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仍然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扬弃和创新。

所有后进的包括 19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向先进国家奋起直追的时代，无不大力引进、消化和应用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对一位日本年轻的经济学家说，“日本人勤奋，教育水平高，吸取别国长处的能力很强，只要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来就可以看到，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很好地从国外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很像 19 世纪的美国。”（见 1999 年 11 月 23 号《经济学人》。）事实上明治维新以来，明治政府的宣言中的“五条誓文”中就有一条“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国基”。100 多年来，日本被公认为世界“翻译大国”。直到今天，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的著作问世，不问其流派，不出一两个月日译本就出版了。特别是古典著作的翻译更是精益求精。例如，《资本论》的译本由权威专家翻译的先后就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的译者注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译本。《国富论》的译本也是如此。古典文学、哲学等译本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并以“文库版”的形式廉价出售，十分普及。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日本的经济学家尚无人获诺贝尔奖，且是一个不足，但要知道日本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它要追赶发达国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吸取别人之长，使之本土化，以增强综合国力，当然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条件执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之牛耳。何况像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不真正代表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在评奖中亦有偏颇。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人们无不痛感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之不足，而来自 21 世纪的各方面的挑战，又亟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知识。日本原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更多的类似之处，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它的现代社会科学对我国有许多实际的参考价值。多年来，我们偏重于欧美，而疏于近邻。为了广求知识于世界，对近邻日本，我们更需要深入了解。

我们组织编译这套《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正是力求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译丛所选的名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而是现代日本学者所撰写、得到社会公认并对我国现实有参考价值的科学著作。本译丛获得了王洛林教授、堤清二博士和生野重夫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大力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前社长王霁博士给予了热情支持。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我们的知识见闻实在有限，衷心希望国内外的朋友给我们以帮助和指正，共同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为整个人类做贡献，则幸甚矣。特此为序。

朱绍文

译者前言

自 1898 年新渡户稻造出版《农业本论》以来，“农业小国”日本关于农业哲学和农学哲学问题的论著已有十余种。本书是作者在主持京都大学“农学原论讲座”（日本大学中惟一的关于农业哲学领域的研究机构）期间，在吸收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积数十年的研究和探索而成的一部最新专著，2000 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而在有史以来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农业国和农民国家的中国，关于农业和农学的哲学问题，始终是一个较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不仅如此，我们对于别人的研究，关注和介绍得也不够。在今天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在农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排挤、冲击和破坏的形势下，从哲学和思想的而不只是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来探讨和思索“农”的问题，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翻译和出版这本凝结着著者多年心血的力作，当会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

本书作者祖田修（Osamu Soda）教授生于 1939 年，1963 年

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曾在农林省工作，尔后返回京都大学农学原论讲座执教，并继柏佑贤和坂本庆一之后于1989年开始主持该讲座至今。本书之外的主要著作有《地方产业的思想与运动》、《城乡结合论》、《大地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等。上述成果奠定了他在当代日本农业哲学和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地位。1997年，祖田修教授被选为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并于1997—1999年担任日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日本地域农林经济学会会长。

关于本书的立论主张及其在农业哲学学说史、学术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内容的阅读得出明晰的结论，我们在此不准备越俎代庖。不过，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鉴于读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在此有必要做一个简要的提示。

第1章主要是对学说史的概括，并对农业哲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定位，认为农业和农学的价值目标在于追求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统一与协调。第2章对农业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回顾，提出迄今表现出的人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及排除和竞争三种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问题。而最近出现的“深度生态学”派关于“动植物的权利”的主张，则带有“环境乌托邦”式的幻想。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将是今后农业和农学研究的奋斗目标。

第3章对农业和农学的价值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演变状况进行了分析，它渐次体现为：生存的维持与生活水准的提高；生态与环境的维持和改善；村落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延续与发展。第一种可以称为“生产的农学”，第二种和第三种可以称为“生命的农学”。在农村社区这一地理空间，将相互分离的三者统一协调起来，追求其综合价值，将成为21世纪的农业和农学的最大目标。作者将自己的这一主张命名为“空间的农学”或者说“场的农学”。而随后的第4章至第6章便是对上述

各种论点的具体描述和分析。在第 7 章里，作者对其主张的要点和实现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

第 8 章对城乡关系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和理论探讨，并着重分析了日本社会存在的资源向东京“一极集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指出健全、合理的城乡关系必须建立在农村与中小城市的统一与融合的基础之上，必须充分重视“地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第 9 章是对农业技术的内发性革新和普及与农村和农业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引进的”外来技术必须充分考虑到农业从业人员的行为特征与“主体性”，否则就只能成为“异质性的”东西而产生异化的结果。而注重经验知识和科学理性的结合必须成为政策制定和科学（农学）研究的关注重点。

最后的第 10 章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现代农学的特性及研究体系、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作为“生命系统”的综合性科学，农学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对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的解决，服务于人类的安康和幸福，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这应当以大地、自然、农业和农村为基础，具备如何使似乎已走向穷途末路的现代文明再生和复兴的眼光，因此需要研究者有相当强的自制性和伦理性。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是：张玉林（南京农业大学）：第 1、3、5、8、10 章；胡浩（南京农业大学）：第 2 章；周应恒（南京农业大学）：第 4 章；苏群（南京农业大学）：第 6 章；赵国庆（中国人民大学）：第 7 章；曾寅初（中国人民大学）：第 9 章。张玉林对译稿作了校阅和统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所论述的问题广博而庞杂，其中的不少部分超出了译者所熟悉的知识领域，因此虽然译者都尽了各自最大的努力，但肯定仍存在着不少因翻译不准确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关键用语的译法可能会令人费解，在此谨由张玉林向作者和读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欢

迎学界同行予以教正。

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得以与中国的读者见面，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策划编辑马学亮先生的远见卓识，他们明知本书没有“卖点”却依然乐意推出，实在令人钦佩。本书的责任编辑熊鲜菊小姐不辞劳苦，做了大量的校正和补订工作，谨致谢意。娄小波教授（东京水产大学）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南京农业大学中日经济文化中心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代表 张玉林谨记

2002年9月于南京东郊

中文版序

《农学原论》的中文版得以与中国的读者见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这本书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哲学论考，在汉译的过程中伴随着很大的困难，但是诸位译者在他们繁忙的研究之余倾力劳作，终于以令人钦佩的毅力顺利完成，我从内心里表示感谢。

据笔者之管见，近来出版“农业哲学”之类著作的，惟有中国和日本。经同样致力于农学研究的中国友人的热情推荐，本书被介绍到中国，我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有助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深化和农业的发展。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家庭与中国有着姻亲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今年还让我喜添了长孙。因此，中国对于我好像在公私两方面都已经成了第二祖国。我似乎切身感受到了21世纪世界的走向。

中国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无论是整个经济还是农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曾四次访问中国，每一次都看到了中国迅速迈进的景象。但不容否认，在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

代化的浪潮中，农业和农村被发展的阴影所遮蔽、被弃而不顾并因此衰退的方面也是存在的。如何取得农工之间的均衡发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的共同问题，而对于亚洲的“小农圈”来说，这是一个尤其紧要的重大问题。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些益处，甚至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些帮助，将给我带来无上的喜悦。

本书的日文版曾蒙金泽夏树、通口贞三、野田公夫、北出俊昭等教授给予较高的评价，但对于它能否得到中国同行的认可，我有些惴惴不安。我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批评。

祖田修

2001年12月于京都大学

前　　言

本书是我这十多年来日夜盼望着早日完成的一本论著，收入其中的多是对最近15年来发表的论文进行大幅度修改、加工后的东西，肯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而我只是将其作为我所理解的农业哲学体系提出来。关于农学史，本书只是简单地触及，详细的论述只能等待将来。

农业哲学领域的研究只有较为短暂的历史。1952年，京都大学开设了日本国内的第一个农学原论讲座（现在称为“分野”），迄今有50年了。最初主持该讲座的是柏佑贤教授，后来是坂本庆一教授，到我应该说是第三代。柏佑贤教授著有日本的第一本《农学原论》，将他之前的理论论述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将农学与工学等所谓应用科学定位为与自然科学、文化科学并列的“第三种科学”，从而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而我作为柏先生的最后一任助手，也从中获得很大教益，在关于农林水产业的科学与现实等问题上大大开阔了视野。

随后的坂本庆一教授密切关注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许多问题，特别注意到生命与环境以及生活等问题，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农业即意味着“生”，具体说来就是生命、生活、人生，也就是说“农=生”，而促进和实现“生”的充实和开花结果被当做农学应追求的价值目标。与柏佑贤先生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和食物短缺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追求经济价值为使命的立场相比，这一视角意味着很大的转换。从哲学背景来看，柏佑贤教授是以新康德派（特别是西南德意志学派）为中心的，而坂本庆一教授的理论则是从生命哲学中汲取营养。可以说这反映了时代变化的状况。而我作为坂本教授麾下的副教授，开始对人类的存在和生存问题发生兴趣。

基于这种背景，我有幸直接受到两位先生的教诲。但我也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两位先生的业绩，同时根据时代的要求来构筑自己的农业哲学理论体系？经过长期的思索，我提出“生命的空间”这一新的概念，认为现代农业和农学的任务在于追求一种综合价值，即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和谐实现，并试图以“作为现代生活世界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地域这一空间”为中心，将两位先生长期探索的理论体系加以统一和重新构建。

而在进行这种努力的过程中，我除了直接借鉴两位教授的学说之外，还从三木清的技术哲学、鲍勒诺夫的希望哲学、欧洲的生命哲学与教育学以及杜威的经验主义的科学论、今西锦司的生物学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正如鲍勒诺夫所指出的那样，杜威的学说融合了欧洲哲学的各种潮流，但同时也反映了专注于行动的美国社会的状况。三木清在批判实用主义轻视历史的观点的同时，从杜威那里也多有吸纳。特别是贯穿于其技术理论中的“构想力”的概念，是以康德的判断力、杜威的经验主义以及重视未来性和创造性的构想性预测这一概念为依据的。而我之所以被技